

城市民生服务对创业活力是虹吸还是溢出？

——基于广东发展的实证研究

梁昌裔¹, 徐达²

(1.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海淀, 100088;

2.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北京海淀, 100088)

[摘要] 提升城市民生服务是促进地区创业活力、协调区域发展平衡、破除城市间民生服务壁垒的关键, 然而不同城市之间民生服务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影响邻近地区的创业活力。基于社会管理、医疗保障、教育文化、通讯基础以及法治保护等五个方面构建城市民生服务指标;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实证研究 2011—2020 年广东省 21 个城市的民生服务水平对创业活力的空间效应, 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城市间民生服务和创业活力耦合协调程度。研究发现, 广东城市的创业活力存在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情况。在具体分布上, 珠三角地区的创业活力明显高于广东省其他地区; 广东城市的民生服务在空间上对本地创业活力有促进作用, 但在空间溢出机制方面, 民生服务水平的提升会阻碍邻近地区创业活力的提升; 同时, 各地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 创业活力较低的地区, 其耦合协调度也较差, 而珠三角地区整体高于其他地区。

[关键词] 创业活力; 民生服务; 区域发展平衡; 空间效应; 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5)01-0107-1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创新和创业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架马车”, 也是一个地区获取竞争力的源泉, 能够驱动生产要素集聚、结构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因此, 创新创业活动无疑是推进区域城市协调发展的关键。

在 2024 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 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 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一直是创新创业的代表。长期以来, 广东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税收政策、开放的市场条件, 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企业落地。2023 年 5 月, 《关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完善民生服务体系, 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 同时也明确要在 2035 年实现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平衡。这既明确指出了企业发展要以民生服务体系为支撑, 同时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广东省未来的重要目标。因此, 分析广东城市的民生服务体系与创业活动的关系, 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与协调性, 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为样本, 对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空间关系问题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问题开展研究, 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广东城市民生服务与

[收稿日期] 2024-04-08; **[修回日期]** 2024-10-21

[基金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动态平衡机制研究”(23ZFG79002)

[作者简介] 梁昌裔, 男, 广东广州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法与经济学、营商环境, 联系邮箱: cupl_liangcy@163.com; 徐达, 男, 山东济南人,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制度经济学、法治经济

创业活力之间的回归关系,并对广东城市间存在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旨在探究城市民生服务对于周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是表现为虹吸效应还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广东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二、文献回顾

目前对于城市民生服务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第一,城市民生服务的价值研究。如温雅婷等基于杭州、贵阳和广州三个地区的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了“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型,发现民生服务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价值共创^[2]。张启春等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2002年到2020年基本民生服务的法律法规等进行分段解读,认为面对当前的新挑战和新要求,应当从制度供给、法律体系、政策执行等方面入手,实现民生服务的价值^[3]。第二,城市民生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例如朱德云等通过实证分析中国265个地区的医疗卫生基本民生服务,发现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卫生基本民生服务存在区域差异,并提出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区域协调发展^[4]。于璇等从省域层面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公共教育均等化水平显著上升、空间绝对差异仍在扩大以及不同类型的财政支持的效果也存在差异^[5]。第三,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影响研究。例如王文姬等实证证明了公共文化服务通过人才聚集的途径促进了地区的创新能力发展^[6]。付明辉等发现城市民生服务的提升对农业人口进入地区就业定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

关于地区创业活力同样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具体集中在创业活力的影响因素和创业活力的作用机制两个方面。在创业活力的影响因素方面,柯蕴颖等根据中国29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有效激发地区创业活力^[8]。张柳钦等以自由贸易区为样本,证明了自贸区建设推动了制度和营商环境的改变,促进了本地的创业活力,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9]。肖小虹等发现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提升了技术市场活跃度,为本地带来了科技人才的聚集,进而提升了创业活力,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技术市场聚集效果更为明显^[10]。在创业活力的作用机制方面,湛泳等认为,实施数字政策,更有利于聚集发展动能,从而推动地区创业活力的高质量发展^[11]。许士道等基于“双创”政策的视角,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创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的共同作用能够显著促进地级市的经济的发展^[12]。

已有一些针对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关系的研究从方法上分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在定量研究方面,杜运周等对中国283个城市的营商环境生态、创新活力与就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法治或政务环境较好、市场和创新环境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生态,驱动了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13]。李其容等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14]。杜运周等在对营商环境与创业活跃度的研究中,采用NCA和fsQCA方法,将民生服务视为营商环境的组成条件之一,发现民生服务与其他多种营商环境条件的组合能够促成地区高创业活跃度^[15]。戴芸等使用医保相关的微观数据对基本民生服务均等化与个人创业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只有惠及更广大的创业群体,才能提高大众的创业积极性,使更多人投入创业^[16]。在定性研究方面,刘畅等分析创业民生服务面临的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要构建由组织制度、资金服务、平台服务以及培训体系支撑的城市民生服务体系^[17]。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研究较少,且存在以下不足:①尚未将民生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探究其与创业活力的关系;②实证研究缺少对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空间关系的研究;③关于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耦合协调问题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综合考虑社会管理、医疗和教育等多个因素,将民生服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②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③探讨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民生服务、促进创业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政策参考。

三、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关系:第一,城市民生服务对本地区创业活

力的直接影响机制; 第二, 城市民生服务对周边地区创业活力的空间影响机制。

(一) 城市民生服务对创业活力的直接影响机制

本文以社会管理水平、医疗保障水平、教育文化水平、通讯基础水平以及法治保护水平为二级指标构建民生服务体系, 并在后续研究中将城市民生服务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但考虑到每个二级指标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各不相同, 因此本部分将对其分别进行讨论。

民生服务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管理。通常而言, 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对社会资源加以整合, 动员社会力量, 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一方面有利于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分配, 创造良好的就业和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教育、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民生服务, 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地区^[18]。

创业活动也离不开地区的医疗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地区拥有完备的医疗服务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使得更多人才愿意选择这一类地区工作生活; 完善的医疗服务可以提高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 使得创业企业有更稳定的人力保障;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 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企业人才的健康保障水平^[19]。

教育文化在吸引人才流入、为创业活动提供人才基础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教育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增长,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素质, 强化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还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好的人力基础^[20]; 另一方面, 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家庭搬入某一地区的重要考量因素, 能促进高学历劳动力的聚集, 从而为创业企业储备丰富的人才^[21]。

通讯基础特别是数字化环境是创业的重要基础之一。一方面, 它使创业者能够迅速获取行业信息和市场趋势信息, 降低成本并优化资源配置^[22]; 另一方面, 使得远程协作成为可能, 让创业团队组建变得更加容易, 企业也得以将产品和服务轻松推向更广阔的市场^[23]。

法治保护是民生服务体系的关键维度。稳健的法治框架能够提供确定性和透明度, 通过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确保契约履行及公正解决商业争议, 营造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同时, 这种环境增强企业家的信心, 促使他们敢于承担风险进行投资与创新, 同时也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与市场的健康发展^[24-25]。

(二) 城市民生服务对创业活力的空间影响机制

城市民生服务通过其外溢性, 对周围地区的创业活力产生影响。与此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为外部性理论。外部性主要是指主体的行为对主体之外的人或事物所造成的影响。随着经济学研究不断地深入, 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对象也从个人或企业延伸至地理区域。地区的民生服务存在着外部性溢出, 刘维林实证研究发现, 地方民生服务的供给不仅会推动本地资源要素的聚集, 也会影响周围地区的要素聚集^[26]。李光武等认为, 跨区域的协调治理可以有效地提高外溢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使得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特征更为明显^[27]。但是外部性并非必然为正向, 也可能出现负外部性的情形。陈涛研究发现, 在部分地区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贫困地区在资源上得到过度倾斜, 导致扶贫政策出现负外部性, 即出现非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民生服务、产业水平等发展相对滞后于贫困地区的情况^[28]。

四、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考察年份选定为 2011—2020 年。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地区统计年鉴》及其官网发布的报告。对于个别缺失数据, 采取插补法予以补充; 地区注册企业数量来自企查查数据库。

(二) 变量说明

1. 地区创业活力

现有关于地区创业活力(EA)的研究, 如白俊红等的研究为消除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 将人口数量

与企业注册数量进行综合计算^[29]，但本研究考虑到解释变量民生服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增加劳动力人口数量来促进企业创业的，不必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将地区当年企业注册数量作为衡量地区创业活力的指标，并取对数处理。

2. 城市民生服务水平

城市民生服务水平(*PS*)是后续实证研究得以开展的关键指标。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该指标大都从文化、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构建。谢地等在关于高质量发展与地区协调发展的研究中，从文化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民生服务的变量^[30]。科技通讯在现代社会中对民生服务至关重要，其不仅重塑生活方式，还能提升民生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李斌等在研究公共服务差异度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时，将科技通讯作为重要的民生服务指标之一^[31]。而法治保护的指标则参考有关产权保护的实证研究^[32]。据此，本文将社会管理水平、医疗保障水平、教育文化水平、通讯基础水平以及法治保护水平作为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 5 个二级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做标准化降维处理，最终测度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标，该综合指标越大，表示城市民生服务水平越高，详见表 1。

表 1 城市民生服务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民生服务水平	社会管理水平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数(人)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数(人)
	医疗保障水平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医生数(人)
	教育文化水平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人)
		小学专任教师数(人)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千册)
	通讯基础水平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
	法治保护水平	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件)

3. 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参考赵晓阳等关于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研究^[33]，选用经济发展水平(*ln_perGDP*)、人力资本水平(*ln_Hc*)、金融发展水平(*Fd*)、科技支出水平(*Se*)四个指标。经济发展水平为地区的人均 *GDP*，取对数，人力资本水平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取对数，金融发展水平为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科技支出水平为科学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将本研究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被解释变量	地区创业活力(<i>EA</i>)	10.68	0.95	13.26	8.96	210
解释变量	城市民生服务水平(<i>PS</i>)	0.00	1.00	9.52	-4.95	21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i>ln_perGDP</i>)	10.81	0.61	12.22	9.72	210
	人力资本水平(<i>ln_Hc</i>)	10.82	0.61	12.22	9.72	210
	金融发展水平(<i>Fd</i>)	0.88	0.42	2.28	0.25	210
	科技支出水平(<i>Se</i>)	0.03	0.03	0.21	0.00	210

(三) 模型构建

(1)空间相关性模型。为探索和分析广东城市创业活力空间分布的相关性，并为后续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铺垫，本文对广东各地区的创业活力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text{Moran's } I = \frac{\sum_{i=1}^n \sum_{j=1}^n \omega_{ij} (x_i - \bar{x})(x_j - \bar{x})}{\sum_{i=1}^n (x_i - \bar{x})^2 \sum_{i=1}^n \sum_{j=1}^n \omega_{ij}}$$

(1)

式(1)中， x_i 为地区的创业活力， $\bar{x}$ 表示地区创业活力的平均值， ω_{ij} 为标准化后的空间地理权重矩阵，本次研究选用的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2)空间计量模型。为探究地区的民生服务对创业活力的空间效应，进一步构建如下空间计量模型：

$$EA_{i,t} = \alpha_0 + \rho WEA_{i,t} + \alpha_1 PS_{i,t} + \alpha_2 CV_{i,t} + \alpha_3 WPS_{i,t} + \alpha_4 WCV + \gamma_t + \beta_i + \varepsilon_{i,t}$$

(2)

式(2)中， i 、 t 分别表示地区与年份， EA 表示地区的创业活力， PS 表示城市民生服务水平， CV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 ρ 为被解释变量地区创业活力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α_1 为解释变量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系数，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γ_t 和 β_i 分别用于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空间自相关检验

根据广东省各地区 2011—2020 年的创业活力数据，通过公式(1)计算，可得到历年的 Moran's I 指数及其显著性，结果见表 3。

表 3 2011—2020 年广东创业活力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表

Year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538***	0.586***	0.303***	0.316***	0.365***	0.366***	0.467***	0.565***	0.669***	0.657***

注：***、**、*分别表示通过 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从 Moran's I 指数的结果来看，2011—2020 广东省 21 个地区的创业活力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大于 0，说明各地创业活力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各地创业活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效应，并且全局 Moran's I 指数在 2011 年到 2020 年间在整体趋势上逐年增加，说明空间依赖性逐渐增强，地区间创业活力差距逐渐增大。为识别具体区域的创业活力聚集情况，绘制 2011 年和 2020 年创业活力的局部莫兰散点图(见图 1)，可以看出，2020 年广东城市主要分布在一、三象限，其中处于第一象限的是 8 个珠三角城市，广东其他城市基本处于第三象限，可见广东省 2020 年的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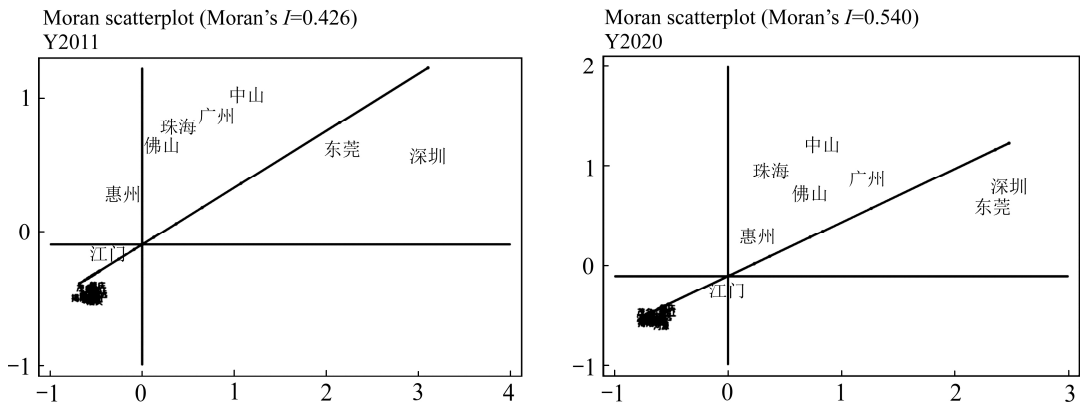


图 1 2011 年和 2020 年广东地区创业活力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散点图

业活力以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为主，说明广东省创业活力在经济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局部空间聚集特征，珠三角地区的创业活力明显强于其他地区。

(二)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估计

本研究利用 Hausman 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于结果 p 值大于 0.1 ($Prob>=chi2=0.195$ 1)，可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26]。在空间模型的选择方面，通过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将 SDM 模型与 SEM 模型和 SAR 模型进行比较，验证了 SDM 模型的适用性，表明在变量间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前提下，SDM 模型不会退化为 SEM 模型或 SAR 模型。因此，表 4 的结果支持选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来分析城市民生服务水平对创业活力的影响。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5)：解释变量城市民生服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说明广东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本地创业活力的集聚程度。但是从空间滞后项(Wx)来看，民生服务的空间滞后性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民生服务水平的提高可能会降低周边地区的创业活力的集聚程度，这还需要后续的效应分解进一步验证。

(三)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空间效应分解

直接效应即本地效应，表示自变量对本地因变量所产生的平均影响；间接效应即溢出效应，表示自变量对其他地区因变量所产生的平均影响^[34]。如表 6 所示，广东城市民生服务水平对创业活力的集聚影响的直接效应为 0.34，说明通过加大对医疗、教育等资源的投入，加强文化建设能够吸引更多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聚集本地，同时通过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推动数字化的民生服务，能显著激发地区的创业活力，但间接效应为-0.68，意味着中心城市民生服务对邻近地区的创业活力是一种“虹吸效应”，即中心城市凭借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等方面的优势对邻近城市产生的资源吸引现象^[35]。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医疗方面来看，可能是医保在地区层面上存在横向的阻碍，即由于医保的属地管理原则和地区间医疗资源的竞争，使得地区横向之间存在执行困境^[36]。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导致人才要素向拥有优质医疗资源

表 4 空间计量面板模型的 Wald 和 LR 检验

检验方法	SDM 是否退化为 SAR		SDM 是否退化为 SEM	
	Wald	LR	Wald	LR
统计值	37.76	40.75	60.19	41.07
p 值	0.00	0.00	0.00	0.00

表 5 民生服务水平对创业活力的空间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EA	
	Main	Wx
PS	0.03* (1.77)	-0.10* (-1.72)
$\ln_perGDP$	0.11 (0.64)	0.24 (0.60)
$\ln_Hc$	0.03 (0.54)	0.10 (0.59)
Fd	-0.08 (-0.73)	0.63* (1.90)
Se	0.29 (0.46)	0.52 (0.24)
ρ 或 λ	-0.37*** (-2.82)	
$\Sigma\sigma^2_e$	0.01*** (10.11)	
样本观测量	210	
Log-likelihood	126.98	
时间固定效应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调整 R^2	0.69	

表 6 民生服务水平对创业活力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S	0.34*** (7.78)	-0.68*** (-6.92)	-0.34*** (-3.28)
$\ln_perGDP$	0.55*** (2.61)	0.27 (0.81)	0.83*** (-0.36)
$\ln_Hc$	0.03 (0.68)	-0.07 (-0.76)	-0.04 (-0.36)
Fd	0.50 (4.15)	0.49 (1.70)	0.99*** (3.05)
Se	-1.54 (-0.94)	7.89 (2.13)	6.35* (1.74)

的地区聚集，从而激发这类地区的创业活力。相反，地区间医保制度的割裂使得周边地区的人们不能从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区受益，这必然会导致周边地区人才要素的减少，从而对周边地区的创业活力产生抑制作用。从教育方面来看，随着地区区域的扩张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学区制度的实施加剧了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和群体间的不平等分配^[37]，人们无法享受附近地区的教育资源，从而阻碍了人才要素的流动，最终抑制了周边地区的创业活力。

(四)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空间邻接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主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见表 7)。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EA	
	Main	Wx
PS	0.04** (2.47)	-0.19* (1.52)
CV	yes	yes
rho 或 lambda	-1.09*** (-3.70)	
Sigma2_e	0.02*** (9.79)	
样本观测量	210	
Log-likelihood	130.04	
时间固定效应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调整 R ²	0.64	

六、耦合协调分析

本文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分析广东城市民生服务和创业活力之间的协调发展状态。参考已有文献，先通过耦合系数模型，计算得出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之间的耦合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反映两者之间的协调效应的耦合协调程度，并依据结果进行等级划分^[38]。

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耦合性公式如下：

$$C=2\times\left\{\frac{EA\times PS}{(EA+PS)^2}\right\}^{1/2}$$
 (3)

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后，具体公式如下：

$$T=\alpha_1EA+\alpha_2PS$$
 (4)

$$D=\sqrt{C\times T}$$
 (5)

式(3)(4)(5)中，C 表示耦合程度，EA 表示城市民生服务水平，PS 表示创业活力，T 表示整体效益，α₁和α₂表示待定系数，D 表示耦合协调程度。

经计算，广东省 2020 年的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D 如表 8 所示。通过纵向

表 8 2020 年广东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的耦合协调度情况

城市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程度	是否为珠三角地区	城市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程度	是否为珠三角地区
广州市	0.99	极度耦合	是	梅州市	0.39	中度耦合	否
韶关市	0.34	中度耦合	否	汕尾市	0.19	低度耦合	否
深圳市	0.91	极度耦合	是	河源市	0.32	中度耦合	否
珠海市	0.32	中度耦合	是	阳江市	0.28	低度耦合	否
汕头市	0.49	中度耦合	否	清远市	0.38	中度耦合	否
佛山市	0.69	高度耦合	是	东莞市	0.66	高度耦合	是
江门市	0.49	中度耦合	是	中山市	0.39	中度耦合	是
湛江市	0.50	中度耦合	否	潮州市	0.16	低度耦合	否
茂名市	0.49	中度耦合	否	揭阳市	0.42	中度耦合	否
肇庆市	0.40	中度耦合	是	云浮市	0.10	低度耦合	否
惠州市	0.55	高度耦合	是	—	—	—	—

比较可以看出: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第一名的广州市为0.99,而最后一名云浮市仅为0.10,两个地区的差距达到了0.89;从地区群的层面上来看,珠三角九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60,非珠三角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7,珠三角地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动的不协调也可能是部分地区创业活力相对落后的原因。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广东省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社会管理水平、医疗保障水平、教育文化水平、通讯基础水平以及法治保护水平等五个方面构建了民生服务指标体系,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地区创业活力的空间差异,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市民生服务对创业活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比较不同地区间民生服务和创业活力耦合协调程度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①广东城市的创业活力存在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情况,在具体区域分布上,珠三角地区的创业活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②广东城市的民生服务在空间上对本地创业活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空间溢出机制方面,城市民生服务水平的提升会阻碍邻近地区的创业活力提升。③广东各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创业活力较低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差。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分析以及检验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服务水平,激发本地创业活力。民生服务既是地区公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地区创业创新的助推器,根据上文分析,本地民生服务水平提升可以增强本地创业活力。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继续加强民生服务建设,以此吸引更多人才要素的流入和集聚,同时也进一步激发本地居民的创业活力,提升地区创业创新活力。

(2) 深化与人才相关的民生服务制度改革,确保人才要素能够充分流动。一方面,通过优化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分布等措施,为人才提供更加公平、便捷的流动环境;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鼓励创新创业,并加强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激发人才的活力和创造力。

(3) 加强数字民生服务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一方面,数字化治理能够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数据的共享提升民生服务的质量,为群众享受民生服务提供便利以及提升群众对民生服务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全方位应用于改造教育、医疗、交通等民生服务,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缓解区域间民生服务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应当继续加大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缩小城际、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为民生服务提供更好的数字环境。

(4) 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推动城市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动协同发展。由上文分析可知,广东部分地区的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仍然偏低,即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动仍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因此,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应当积极探索民生服务与创业活动的协同发展机制,健全创业民生服务体系,完善创业支持体系,推动地区公共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应当积极着眼于数字化创业活动,加大数字化基础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为数字化创业提供新的服务政策和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 [1] 孙勇,张佩,张亚峰.创新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经济问题探索,2022(4):37-54.
- [2] 温雅婷,余江,洪志生,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研究:基于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3):101-122.
- [3] 张启春,杨俊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演进历程和新发展阶段策略调整:基于公共价值理论的视角[J].华中

-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3): 47-56.
- [4] 朱德云, 刘慧. 中国城乡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2(10): 143-160.
- [5] 于璇, 王晓静.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地区差异及时空收敛性[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7): 55-60.
- [6] 王文姬, 王冉. 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 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学习与探索, 2022(9): 157-164.
- [7] 付明辉, 刘传江, 董延芳. 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 基于城市劳动力需求冲击及房价异质性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8): 52-71.
- [8] 柯蕴颖, 张青睿, 王光辉.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如何促进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要素协同视角的解释[J]. 经济问题探索, 2024(8): 73-86.
- [9] 张柳钦, 李建生, 孙伟增. 制度创新、营商环境与城市创业活力: 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10): 93-114.
- [10] 肖小虹, 彭金霞, 贺小刚. 技术市场赋能地方创业活力: 来自中国省级地区的经验证据[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10): 53-76.
- [11] 湛泳, 李珊. 智慧城市建设、创业活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22, 48(1): 4-18.
- [12] 许士道, 江静. 创业活力、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发展效率: 基于 283 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 43(3): 1-13.
- [13] 杜运周, 孙宁, 刘秋辰. 运用混合方法发展和分析复杂中介模型: 以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活力, 协同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优先”为例[J]. 管理世界, 2024, 40(6): 217-237.
- [14] 李其容, 王春淼, 王涵, 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4, 21(8): 1173-1181.
- [15]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 [16] 戴芸, 王永钦.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促进了个人创业: 来自医保改革的证据[J]. 财贸经济, 2022, 43(2): 39-53.
- [17] 刘畅, 李兆友. 创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5(3): 120-126.
- [18] 栾海清.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公平与共同富裕: 逻辑关系和政策支撑[J]. 学习与探索, 2022(5): 145-152.
- [19] 金祥义, 张文菲. 医疗支出、健康人力资本与企业出口扩张[J]. 南方经济, 2022(9): 36-58.
- [20] PETRAKIS P E, STAMATAKIS D. Growth and educational levels: A comparative analysi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2, 21(5): 513-521.
- [21] 李小帆. 人口迁移、地区教育水平与福利差距[J]. 世界经济, 2022, 45(7): 73-97.
- [22] 陈媚, 许恒. 双重竞争效应视角下的数字平台互操作影响分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4(5): 62-76.
- [23] 韩莹, 谢磊. 数字经济网络视域下平台赋能对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45(2): 125-144.
- [24] 付子堂, 常安. 民生法治论[J]. 中国法学, 2009(6): 26-40.
- [25] 张东. 法治如何促进大众创新创业: 基于专车服务微观样本的分析[J]. 法学, 2016(3): 13-25.
- [26] 刘维林. 地方公共服务如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 : 基于要素集聚及空间外溢效应的检验[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9): 109-115.
- [27] 李光武, 张文钺. 地方政府合作提供外溢性公共品的机制分析: 基于决策权分配的视角[J]. 财政科学, 2022(8): 43-56.
- [28] 陈涛.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2): 52-60.
- [29] 白俊红, 张艺璇, 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6): 61-78.
- [30] 谢地, 荣莹, 叶子祺. 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群协调发展: 马克思级差地租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2, 57(10): 156-172.
- [31] 李斌, 李拓, 朱业. 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 基于中国 286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5(6): 79-90.
- [32] 马新啸, 汤泰劫, 王红建. 产权司法保护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J]. 金融研究, 2023(9): 112-130.
- [33] 赵晓阳, 衣长军. 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吗?[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2(11): 19-31.
- [34] 方杏村, 田淑英, 王晓玲. 财政分权、产业集聚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J]. 城市问题, 2020(4): 62-71.

- [35] 孙平军, 王颖. “产权区域”经济地理学外部性研究及其“中国化”[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5): 1-6, 63.
- [36] 吴光芸, 方林敏. 我国异地医保政策的执行困境与破解: 基于政策网络视角的分析[J]. 中国卫生经济, 2018, 37(4): 5-7.
- [37] 饶映雪, 林国栋. 供需平衡视角下城市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以武汉市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1(5): 147-152.
- [38] 李真. 金融能级与城市产业创新竞争力: 城域分化与耦合协同[J]. 财经研究, 2023, 49(9): 19-33.

Does urban livelihood service have a siphoning or spillover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LIANG Changyi¹, XU Da²

- (1.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Enhancing urban livelihood services is key to promoting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coordina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breaking down barriers in intercity livelihood services. However, disparities in livelihood service levels between cities ma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neighboring areas. This study constructs urban livelihood service indicators based on five dimensions: social governance, healthcare security, edu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legal protection. Using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t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effects of livelihood service levels o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cross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0, with further 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livelihood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cross different cities. The researches reveal that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Guangdong exhibits high-high and low-low 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s. Specifically,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ly higher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an other areas in the province, while local livelihood services positively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within cities, the improvement of such services exhibits inhibitor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Moreover, substantial disparities exist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regions with weaker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show poorer coordination, where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maintains overall higher coordination than other area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livelihood servi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balance; spatial effects;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编辑: 何彩章]